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发展研究》丛书 叶启绩 钟明华 主编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人学基础

钟明华 魏传光 等 著



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发展研究》丛书 叶启绩 钟明华 主编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人学基础

钟明华 魏传光 等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林 敏

封面设计:林静文化

版式设计:文渊阁图文工作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人学基础/钟明华 等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0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发展研究/叶启绩 钟明华主编)

ISBN 978-7-01-014947-9

I. ①社… II. ①钟… III. ①人学-政治制度-研究-中国 IV. ①C9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37085 号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人学基础

SHEHUIZHUYI HEXIE SHEHUI DE RENXUE JICHU

钟明华 魏传光 等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市通州兴龙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5.5

字数:200 千字

ISBN 978-7-01-014947-9 定价:3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总 序

当今的时代变化万千、世界矛盾纷繁、中国和平崛起，这一切让人目不暇接、使人困惑不解，甚至让人还没有思想上的准备。人类历史的发展已经昭示这种转变的必然，世界的变化也意味着人类又一次抵达社会发展的关键转折点。这些对中国来讲，必然是一个充满着机遇与风险的困惑、发展与稳定的冲突、改革与创新的矛盾并存的时期。这不仅需要我们坚定的信心、拼搏的勇气，而且更需要具备科学的理论水平、高超的智慧，这样我们才能站在时代的制高点，观察世界的变化，审视中华民族的过去和现在，探求中国未来发展的新方向与道路。

铜山西崩，洛钟东应，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表现出了它强大的生命力。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已充分证明，什么时候坚持它，我们就走向胜利；什么时候违背它，我们就遇到挫折。中国共产党人正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接受的。这使屈辱、贫弱的中国获得了民族独立与解放，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并开始迈向中华民族复兴的征程。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

马克思主义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面对21世纪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以及中华民族的复兴伟业,我们仍然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需要它的理论与智慧。同时,当代社会发展的实践,又为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提供了奔涌的源泉,使之与时俱进。

基于以上的思考,我们依托中山大学国家重点培育学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建设,组织撰写了这套“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发展研究”丛书。丛书共有五本,各自从不同的方面研究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发展的关系。努力用马克思主义来把握当代社会发展的特点与规律、探索解决现实问题的途径与方法;同时通过研究当代社会发展的变化,对之进行理论的概括、思考的升华,来深入研究其对马克思主义的内涵的丰富与价值的发展。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文化和谐发展研究》一书在总结中国改革开放前意识形态与文化不和谐发展的教训、探究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意识形态与文化两者关系上的失误、思考西方发达国家在处理意识形态与文化两者关系上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探讨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文化与意识形态两者之间和谐发展的特点、规律、机制;两者的和谐发展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的功能、作用、方法;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发展先进文化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目标任务、基本原则和制度保障等。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一书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实现人类的解放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科学理论体系。探究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如何体现目标与过程的统一、规律性与价值性的统一、科学性

与意识形态性的统一。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关于实现人类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的历史进程、依靠力量、方法与途径等。从中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将不只是作为“阶级的真理”，而还将作为“个人的真理”、“人类的真理”而存在与发展。

《中国政治现代转型的轨迹》一书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对民主政治的探索与建设，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民主政治建设的思想理论资源——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作了最新的系统梳理与评述。同时客观地评述了毛泽东对人民民主的实现形式所做的一些虽不够成功、但可贵可鉴的探索。正是在对这些经验教训总结过程中，可以认识到中国在新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它有益于对民主问题关心而理论上又缺乏研究的读者更好地认识民主建设的中国特色道路。

《弗罗姆与马克思的批判理论》一书在西方思想史的背景下，重新解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在此基础上阐释了弗罗姆视野中的马克思思想，分析了弗罗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理解和把握，提出了他独创性的社会心理学思想——社会性格学、社会无意识以及人性理论，并以此作为批判武器，揭露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矛盾和危机。他的社会心理学也最大限度地发掘了马克思对心理学的贡献，一定意义上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人学基础》一书探讨了马克思对社会构建与发展研究中的深刻的人学思想。同时通过对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等人的社会建构实践的理论审视与人学反思，认为他们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源，有助于深化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与价值分析。同时在分析当今中国一些方面不和谐现状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通过制度创新、教育模式重建和人文环境优化等路径来推进人学基础建设，进而促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这些书中，既有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课题的最终研究成果，又有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们都为其付出了自己很多的心血，并力求有所创新。当然，由于我们的理论水平与认识能力有限，这些研究成果难免存在不足，许多问题的研究还有待我们深入地学习、探讨和深化。我们愿意向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广大读者求教，努力提高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发展研究的水平。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发展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2010年8月于中山大学康乐园

总 序 /1

第一章 和谐社会的人学解读:概念分析与关系阐释 /1

第一节 和谐社会与人学:概念梳理与界定 /3

第二节 人与社会的结构性关系:和谐社会的人学基础 /20

第三节 人学视界中和谐社会的历史钩沉 /35

第二章 马克思社会构建理论中的人学思想 /47

第一节 马克思社会构建的主体思想及其人本倾向 /48

第二节 社会构建主体形成的障碍及其清除路径 /65

第三节 马克思社会构建理论对人与社会关系的基本构想 /84

第三章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审视和人学反思 /95

第一节 早期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验及其启示 /96

第二节 苏联探索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人学反思 /116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反思 /138

第四章 当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人学意蕴 /153

第一节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主体的人本诉求 /154

第二节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视野中的“人” /162

第三节	双主体的交往模式	/165
第四节	群体与群体公正平等的竞争模式	/177
第五章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路径	/187
第一节	凸显社会建设主体与建构公民身份	/188
第二节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与建立“善政”	/194
第三节	建立人际交往和诚信机制与和谐教育模式的构建	/206
第四节	保护生态及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模式的建立	/218
主要参考文献		/229
后 记		/233

第 一 章

和谐社会的人学解读：
概念分析与关系阐释

中共中央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正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目标与任务，并在十六届六中全会上对其给予了全面阐述。胡锦涛同志在2005年2月19日省部级和谐社会研讨班的重要讲话中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答做出了科学界定，认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其实，在人类漫长的进化历程上，人一直尝试着勾勒出一理想世界的蓝图，不论是希腊人柏拉图的“理想国”，英国人摩尔（Thomas More）的“乌托邦”，还是中国孔子的“大同”和陶渊明的“桃花源”，都提出了相似的社会模型，真实地表达出人类对和谐社会的追求。

但由于他们对于人与社会关系结构认识的差异，对人及社会价值定位的差异，概括地说，即和谐社会的人学基础不同，看似众多的和谐社会追求具有“家族相似性”，但实质上其理论与实践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当前理论界和学界多从社会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等视界对和谐社会展开研究，集中于社会结构层面的变迁与发展层面的探讨，而从人学意蕴与价值内涵的角度进行系统分析则显得相对薄弱。一方面，人学，尤其是马克思人学作为一种显学，不应在这种重大社会理论与实践“失语”；另一方面，作为一种价值追求与社会发展理念，和谐社会也需要在中西的比照分析和历史的钩沉中运用人学视界进行阐释，寻找和谐社会建设的人学基础。否则，既难以明晰和谐社会理念的差异，更难以确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归依。尽管近几年随着人的主体地位的提升，“以人为本”成为和谐社会理论探讨的主题，但似乎这些理论探讨又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从“遗忘人”变成了“悬搁社会”。人学的视界既不是“无人的”，更不是“只有人的”；不是人与社会的隔阂与二元对立，而是同一事物的不同展开。因此，通过文本解读和历史钩沉的人学分析，立足于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来探讨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的建构，展开和谐社会人学基础的研究，对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双向互动关系进行现代阐释，可以拓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研究视野，深化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解。同时也可以在此基础上深度挖掘和谐社会与人学主体的互动流变，通过现实问题的考察，带动和促进人学基础理论的深入研究。

第一节 和谐社会与人学： 概念梳理与界定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人学基础作为一项研究课题，首先需要对其基本概念，包括和谐、和谐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马克思人学进行界定，并在古今中西比析中加以梳理，勾勒出一些核心的范畴。

一、何谓“和谐”

对于“和谐”的认识，不能仅止于概念层面。需要通过在考辞学的基础上对中西思想史进行比较，总结出“和谐”所蕴含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实质。从这个方面讲，“和谐”不仅是一个概念，更是一种文化。

1. “和谐”是一种状态，并且是理想性及源生性的状态

在中国古代，和谐是一种共生的状态。古人认为，事物是共生于一个统一体中，在统一体的内部，各事物以对方的发展为前提，相生相息，并且认为事物只有共生于一个统一体中时，才有和谐可言。这点可以从“和谐”的考辞学中充分体现。和谐的“和”，其构形有“龢”，是由“龠”与“禾”两个构件所组成；和谐的“谐”，其构形有“諧”，是由“龠”和“皆”两个构件所组成。追溯其源，这两个字的构件各有深意在焉。汉字研究鼻祖许慎所著

《说文解字》指出：“龠，调也。从龠，禾声。读如和同。”^① 其中的“龠”是“乐之竹管，三孔”，其功用是“以和众声也”，其构形是“从品侖。侖，理也”^②。可见，“龠”是古乐器，是管乐类乐器的代表，也是众多乐器的代表。而乐器具有“和众声”之功能，故徐灏《段注笺》说：“龠以和众声也，故龠龠字皆从龠也。”更为重要的是“皆”字的涵义。许慎说“皆”：“俱词也。从比，从白。古谐切。”^③ 而比，“密也。二人为从，反从为比。凡比之属皆从比，𠂤，古文比。”^④ 这说明构成“皆”的“比”构件，具有两个义素：一是由“人”构成，二是蕴涵有“密”，因此“比”所要表示的信息就是与人有关，并且是相当多的人的行为。在《尚书》中，“和谐”被广泛地应用到家庭、国家、天下等领域中，用以描述这些组织内部治理良好、上下协调的状态。通过对和谐的考辞，可以看出“和谐”二字蕴含着共生的内含，共生可以看作是和谐的质的规定性。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共生关系的指向具有包括人在内的宽阔空间，包括人与自然的共性、人与社会的共生、物质与精神的共生。

和谐不仅是一种共生状态，而且这种共生状态还是万物之源，是宇宙和人生的最高境界。《春秋繁露·卷十六》曰：“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荀子·天论》也说：“万物各得共和以生。”认为只有和谐，万物才能繁衍生长。老子指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⑤。认为万物阴阳两个方面激荡调适成中气，就形成了一种适匀和谐的状态，在这个状态中，万物生成。《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指出和谐是天地万物孕育发展的根基与关键。《论语·学而》提出“和为贵”，

① 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8页。

② 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8页。

③ 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74页。

④ 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69页。

⑤ 《道德经·四十二章》，陕西旅游出版社2004年版，第56页。

把和谐视为天底下最珍贵的价值，人世间最美好的状态。孟子则将其发展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思想，“人和”是处理人间万事之要件，具有最高的价值。

与中国人信奉中庸之道相契合，西方早期的思想也给予和谐以较高的评价。和谐（harmonie）乃为古希腊哲学用语，源自动词“hamozein”，意指“适合一起”（to fit together），也被译为“调和”（adjustment）或“和谐”（concord）。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触及和谐思想的是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Πυθαγόρας），他用之解释天体运动规律。据说毕达哥拉斯学派有两句著名的哲学格言：“什么是最智慧的——数，什么是最美的——和谐。”在毕达哥拉斯学派看来，作为本原的“数”之间有一种关系和比例，这种关系与比例产生了和谐。就此而言，万事万物都是和谐的，所以，“整个的天是一个和谐，一个数目”^①。他们认为，宇宙的基础有三，即平均、秩序与调和，并在数量的比例中展现着音乐式的和谐，日、月、星、地等彼此间距离存在数的比例关系，构成整个宇宙的和谐。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接受这种“天体和谐说”。不仅如此，毕达哥拉斯学派中的一部分人认为灵魂是按比例结合处于两极端事物而形成的一种和谐，灵魂的和谐依赖肉体，并提出美德就是和谐，把和谐看作是宇宙和人生的最高境界。文艺复兴后，笛卡儿（René Descartes）、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等都主张和谐。莱布尼茨提出“预定和谐”的命题，他认为“宇宙是一个由数学和逻辑原则所统率谐和的整体”，世界万物是由一种叫作“单子”的基本因素构成的，而“单子”由于绝对单纯而不能再分割，没有“窗子”可供出入，因而彼此之间不能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但宇宙万物却相互协调，构成为一个和谐的总体。总体和谐论的思想还被广泛应用到各个学科领域中去，例如文艺复兴时期的

^①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7页。

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Johannes Kepler）在观测行星运动的基础上，写出了《宇宙和谐论》一书，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天体运动的总体和谐图像。

当然，作为共生的和谐是合规律的状态，不同的东西并不是天然就是和谐的，许多不同的东西要按照一定规律构成一个整体，这才是和谐。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音乐是对立因素的和谐统一，在一定规律的支配下，把杂多形成统一，把不协调变成协调。黑格尔将和谐看作为整齐一律、平衡对称、符合规律之后的高级阶段。他在《美学》中说，和谐是在事物本质中找到它的根据的，而事物本质中的根据即是规律。

2. 和谐由自然哲学向社会的方面转化，开始具有社会意义

和谐范畴经历了一个由贫乏到丰富，由朦胧到清晰，由简单到复杂，由抽象到具体的逻辑进程。在中西思想的早期，和谐范畴是作为同混沌相反的宇宙的组织性而出现的，随着认识水平的提高，和谐开始由自然哲学领域转向精神和社会领域，开始具有社会的意义。

在中国，和谐的社会涵义开始由先秦诸子阐发。以李聃、庄周为代表的“老庄哲学”认为，和谐就是“无为而治”与“顺天安命”，并通过“弃圣绝智”与“禁欲主义”来消除纷争与矛盾，以“小国寡民”的社会图式与群体建构来达到和平安宁：“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心不乱。”“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①可见，道家比较强调一种精神上的逍遥与自由，“形莫若就，心莫若和”^②。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子学说以“治天下”为己任，则主张以“兼爱”与“非攻”来实现人类的和平，通过技术进步来实现社会的发展与和谐，使人与人、

① 《老子·道德经》。

② 《庄子·内篇》。

国与国、人与社会和睦相处，共同发展。墨家认为兼相爱即仁，交相利即义，义建立在利的基础上，只有平衡利的各方，统一利的尺度，才符合社会全体的利益，社会才能和谐，社会人人方可“交相利”。墨家所主张的和谐是一种社会全体成员竭尽所能、各得其所的和谐。战国末期的荀子认为，“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①。可见，社会和谐也是荀子重要的政治价值观。

尤其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更是对和谐推崇备至。概括而言，儒家以“人和”为中心价值观，提出系统的“仁政”型社会和谐思想。这就是以人性善作为制度伦理的出发点，以忠孝为原则的“亲亲尊尊”上下等级分明的伦理秩序，以个体的道德修养与人格完善来消解“物我矛盾”、“人我矛盾”，以“天人合一”为基础的善正义，通过善的化育形成以“礼”为核心，“敬德”、“保民”的政治价值观，奉行以忠孝为准则的人际交往原则，从而建构起以道德和谐为核心，以上下和谐为主干，以善政善教为两翼的“仁政”、“德治”、“一君万民”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和谐。其中，“仁者爱人”是和谐的道德原则，忠恕之道是和谐的具体途径，和而不同是和谐的存在形态。可以说，“仁义礼智，忠信和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乐以治心、礼以治躬”、“乐极和，礼极顺，内和而外顺”，这些儒家话语都透视出社会和谐的意蕴。

儒家和道家不仅继承了《尚书·尧典》中“协和万邦”、《诗经》中“亦有和羹，既戒既平”、《周易》中“天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等有关和谐的思想，而且还各自从不同侧面发展了这一思想。孔子从伦理和社会角度，道家从宇宙观角度来谈“和”，使“和谐”成为中国人哲学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核心。这种“和谐”理念经过长期的熏陶，渗透在

^① 《荀子·王制》。

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日常生活中常讲祥和、谦和、温和、和睦、和蔼、和善、和气生财、和衷共济、政通人和、内外和顺、家和万事兴等，体现了一种博大宽广、包容兼顾的精神境界，体现了追求协调、团结、齐心合力开创未来的客观要求，和谐思想造就了中华民族成为爱好和平的民族，形成了多民族和睦共存、多元文化融合共生的局面，重视人与社会、自然统一性的文化传统，这是中国文化的精华所在。

在西方，自苏格拉底开始，“和谐”思想被引入社会领域和人文领域，从而产生了西方社会政治领域中的“和谐社会”思想。苏格拉底是在自然哲学的尽头，转向“善”、转向“自我”、转向“人”的，苏格拉底哲学在和谐观上的贡献在于他开始赋予和谐以社会的意义。但真正实现和谐观向社会领域转向的则是柏拉图。柏拉图除了发展以前的和谐思想外，更重要的是他明确地使和谐范畴更具有社会伦理的意义，使和谐观进一步伦理化了，他把和谐作为人类的一种道德理想来研究，其代表性著作《理想国》主要论述探讨的是如何建立和谐美好的国家。柏拉图认为“正义即和谐”，“公正”是跟“和谐”密切相关的，社会和谐的根本基础在于正义，这种正义的实现就在于社会各等级之间各守其位，各司其职，互不僭越。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国家是放大的个人，个人是缩小的国家。人具有三种德性：智慧、勇敢和节制。如果三者达到了和谐一致，便是“公正”。

在柏拉图影响下，亚里士多德把和谐看成是整体的统一性和完满性，是多样性的统一，并坚决把这个概念应用于现实的一切领域，进一步丰富了和谐内容。例如在社会领域，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权应该由中等阶层来掌握，这样就能很好地协调贫富两个阶层的利益，避免矛盾和冲突，从而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尤为重要的是，亚里士多德证明并发展了毕达哥拉斯的灵魂学说。他在《论灵魂》一书中指出，“灵魂是一种和谐。因为：（1）和谐是对立物的一种融